

10.26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盐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录

编辑凡例

- 胡乔木同志早期在盐城的办报活动……………曹晋杰（1）
- 西南党和中央党……………张少逸（4）
- 记盐城贫儿教养院的始末……………张少逸（10）
- 盐城“双十事件”前后的经过……………曹 流（14）
- 忆亭湖中学工作组和学生寒假工作队……………赵 定（22）
- 战争时期的盐城县中……………陈栖山（31）
- 二次革命时期的盐城二三事……………吴章甫 王子宜（41）
- 谈谈耿华堂……………何爱吾（47）
- 瞿秋白烈士在狱中片断……………陈子刚（50）
- 回忆叶挺城和胡特庸、程步风…刘宗口述、周白若整理（57）
- 郭猛烈士英雄事略……………季龙全整理（71）
- 回忆盐城“参议会”的筹建经过……………唐碧澄（74）
- 被俘记……………宋泽夫（79）
- 忆我的祖父宋泽夫……………宋广陵（87）
- 略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党务斗争……………陈斯白（92）
- 国民党盐城县党部丑闻一则……………孙石璧（99）
- 伪国大代表联谊会见闻……………徐小荔（104）

日寇初陷盐城前后的县商会	<u>何爱吾</u> (115)
顽韩军队在黄桥复灭与曹甸被歼纪实	
.....王亚陆 杨希文 (126)	
谈谈汉奸董际唐与盐城维持会和自治会	<u>曹 流</u> (143)
记日伪时期的盐城谍报组	<u>曹 流</u> (150)

胡乔木同志早期在盐城的办报活动

曹 晋 杰

一九三一年，胡乔木同志（原名胡鼎新）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离校到北平团市委工作，不久因团市委在团省委左倾领导下被解散改组，组织上同意他暂回家乡——江苏省盐城县张本庄——短期后再返北平。一九三二年五月，乔木同志回到盐城。这年秋天，经过贫儿院中共党员刘必成同志介绍，认识了中共盐城县委书记蔡道生（原名嵇荫根），由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组织活动。

一九三三年春季，由乔木同志主编，出版了《海霞》半月刊。这个刊物是由“综流文艺社”出面办的。“综流文艺社”是个进步青年组织，成员有四、五十人，其中有几个地下党员，理事会是由民主选举的，理事长是盐城儒学街小学教师乔冠军。因乔木同志不能公开出面，就由乔冠军担任了刊物名义上的主编。

《海霞》半月刊是个文艺性刊物，三十二开本，刊头是美术字，封面图案是“海边激浪，跃出一轮红日”，目录就印在封面上，这是当时盐城女中的美术教师陈栖山设计的。每期内容有散文、小说、诗歌等，主要宣传反封建独裁，争民主自由。当时办进步刊物很困难，资金是几个人筹集的。稿源也困难，除了乔木同志，只有乔冠军、陈延庆（王

翰)、乔冠军、邱剑鸣、张景炎、陈廷宪几个业余作者。其中以乔木同志撰写的较多。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从上海回盐的中共党员陈延庆,经乔木同志介绍,与当时盐城地下党负责人见面,并和乔木同志一起散过传单,为《海霞》写过介绍巴黎公社和介绍苏联状况的两篇文章。《海霞》是由盐城《民声日报》记者邱剑鸣(化名邱离天),通过“民声印刷厂”老板陈廷启的关系,请他们代印的。发行靠贫儿院刘必余和一个姓臧的青年出售,一部分免费赠送。这个刊物是受到封建笼罩的古城一些进步青年欢迎的。但是,《海霞》半月刊只出了三期(第二、第三期是合刊),就停刊改出《文艺青年》。《文艺青年》名为周刊,实际不定期,每期八开四版一大张,刊头四个美术字也是陈栖山写的,刊物仍由乔木同志主编。《文艺青年》无论内容和形式,比《海霞》要活泼一些,定价低廉,发行数量也增加了。大约出了四、五期后,因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及其妻子先后被捕叛变,嵇带人到盐城贫儿院(院长朱木香是乔木同志姨父)搜捕乔木同志,乔木同志才离开盐城回家。由于北平团组织遭到破坏,原定联系中断,因而去杭州进浙江大学就读,《文艺青年》也随之停刊。

乔木同志在盐城时,介绍邱剑鸣(现名胡扬)入了党。乔木同志走后,邱剑鸣接替他办报,他主编了《玫瑰刺报》三日刊,办了一个多月,出了十几期。因在报上揭露了省立盐城中学的国民党军训教官在操场上的法西斯暴行,国民党县政府下令关押了邱剑鸣等人,后虽得到新闻界声援获释,但报纸被勒令停刊了。

乔木同志在盐城的办报活动,通过报刊宣传革命思想,

使当时一些社会青年和中学生受到积极的影响。据邱剑鸣同志回忆，当时乔木同志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和学生，他和胡文新、袁玉清等人，就是受乔木同志影响并经他介绍入党、入团的，邱、胡、袁曾多次于深夜相偕散发革命传单，还有还佩琮（还寄萍）、刘剑五等青年，后来也积极参与了革命活动。

西南党和中央党

张 少 逸

敬请读者不要误会，所谓西南党和中央党，并不是什么政党或团体，而是盐城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初期这一阶段地方绅士中的两大派系，并由此产生了派系斗争。因此人们习惯称之为“西南党”或“中央党”。

在清朝末年，盐城较有声望的老绅士有陶湛春、陶小石、郁右轩、李保堂、陈幼香等人。湛春与小石是堂弟兄，都是本邑的大封建地主兼资本家，而两人素不相能，各成一派。小石负清名，重气节，思想较开明，因此威望较高。其时，正值戊戌变法以后，光复浪潮，汹涌澎湃。地方上的老绅士逐渐隐居落伍。一批年青而趋志于维新的人士，就逐渐参与地方事务，地方官吏也非常倚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敢说敢为。于是便形成了一批新绅士。其中有宋泽夫、金泽苍、马为珑、马为理、刘启晴、卞仲咸、胡启东、胡鉴青、赵雨生、赵乃秋、刘障东及我父亲张逸笙。我的母舅吴继炎、吴继英等人，他们力主维新，以公正廉洁相勉励，极力反对当时社会上的旧势力，敢说敢做，颇得民心，深受群众爱戴。我父张逸笙早在清宣统元年即被选为江苏谘议局议员。金泽苍在光复时即被地方推举为盐城民政长（即县长）。他们和衷一气，一心想把地方事情办好，虽然当时的立场观点也有所不同，然而都能求同存异，相互谅解，取长补短，就当时

而论，可谓是一批较进步的绅士，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西南党的萌芽时期。

陶湛春于民国初年去世，其子慎甫继承父业，并且也想出人头地做个大绅士。然而他不才，就以薛星垣做谋士。薛星垣在地方人士中虽有一点威望，但不服众。于是以贿赂方式为薛买得一个省议员的席位，这笔钱当然要有陶慎甫全部资助，这样薛星垣一跃而成为绅士，做了陶氏的左右手了，他们又联系丹徒人在盐城做商会长的黄立三，和曹厚培、陶绍甫、陶星甫、徐绍勤、凌慧庵、夏逸桴等人共成一派。公元1920年时，邑人马伯良任江苏第三师师长，继又升任清江护军使兼军长，声势煊赫，薛等乃奉马为首，联系当时衙门的一班旧书吏如田耀东、熊步宽、李清等人作为他们交结官府的耳目，包揽词讼，贿赂公行，无所不为，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官府衙门中的中、上层人士为优势的绅士派系，所以人们称之为“中央党”，和“西南党”相抗衡，1925年马伯良下野，他们又以盐城建阳镇人（现属建湖）省议员郝儒琳为首，但郝对地方事并不关心，仅挂虚名，实际上中央党的一切事务均由薛星垣掌管。

1919至1927年间，两党明争暗斗，相互争斗，最为激烈。因西南党人基础较好，且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中央党多数是衙门口的一班旧书吏和少量客籍人，有的人表面上是偏向中央党人，实际上是两面派，只要有钱，他们什么也干得出来。因此地方官员也不得不采纳西南党的意见。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即民国九、十年间（1921年左右），有个苏州人叫唐慎方的任盐城县知事（即县长），因初来不熟习地方情况。开始双方都想争夺，唐因受了中央党的包围，对西南党

人未加重视和照应不周。触犯了西南党人的尊严，西南党人告到省方，结果唐慎方被奉令撤职，由到任到撤职，不足三个月。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当时一些地方机关如实业局（即建设局）教育局（旧名劝学所），警备队等单位的主管人，两派均互相竞争，竞争结果以西南党占优势。如教育局长宋泽夫，实业局长金德斋（留英学生），警备队营长吴继康（继炎弟），县第三科长苏智卿，以及后来的县府秘书张趾亭，县建设科长成沧江，警察局长沈亚东等皆西南党人形成一股实力派。而县第四科长徐绍勤，城区区长薛炳南，商会会长黄立三等则都是中央党人物。那时盐城全县共有十四个区，每逢区长缺出，两党亦尽力相争，不过这不算主要锋芒罢了，原因是区长权势不大，起不了什么主导作用。两党在办学办报的问题上竞争亦较激烈。并以此作为发展人材，扩大声势的基础。如宋泽夫办亭湖中学，油业公会办景鲁中学，皆西南党人所创办。中央党的夏逸樾也办了时化中学。西南党办了新公报，中央党办了民铎报，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当时两个派系的钩心斗角，相互竞争，你拉我打极尽争夺之能事。在那时候，盐城居仁里的曹五房，是中央党的俱乐部（厚培死后即转为薛家大楼），城西北的贫儿教养院，则是西南党的俱乐部。（原来在陶六房，即陶小石之子陶诵清家，现为盐城纺织品公司和人民饭店），各党均经常集会商谈，俱乐部内酒绿灯红，宴会不绝。

西南党人的首要人物，都是当时地方上比较有地位的绅士，他们来之于各界，也比较主持正义，崇尚气节，在群众中颇有地位、声望。如宋泽夫、胡启东、金泽苍、赵雨生、吴继英、吴继炎，及先父张逸笙等人，他们不但能严格地崇

尚民族气节，而且不畏强暴。可是后来为了扩大势力，加入这一派系的人多了，因而流品复杂，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贪污纳贿的，叛变投敌的有，最突出的如成沧江、刘应生、沈亚东、司正林等表面上非常规矩，而暗地里营私舞弊，无所不为。叛变投敌的有金德斋、杨幼江投降日寇、杨庚、赵闾生（雨生之弟）效忠顽匪，均为人所唾骂。甚至连首脑人物季龙图也未能保持晚节，于1947年应蒋记匪县长刘仙沛之聘而出任匪盐城县参议会议长，做了不少见不得天日的坏事。

中央党里面的人士情况就更加复杂了，除徐绍勋等为人厚道，也比较洁身自爱外，专以弄钱行贿为务的莫甚于薛星垣、黄立三、马伯良等人。田耀东、李清、熊步宽等人，本是衙门的一班宵小，其贪污舞弊更不足奇怪了。

1927年夏，北伐成功，北洋军阀政府告终，国民党掌握了政权，反动派的党老爷们是不相信旧绅士的，他们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当时我的父亲和陶慎甫，薛星垣等都在被打倒之列，因此西南党和中央党的人皆杜门谢客，不再与闻地方事务，因而两党的斗争也就无形终止。可是没有多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党老爷们，竟把持官府，横行霸道，贪污舞弊，更甚过过去的旧绅士，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影响极坏。于是被打倒的旧绅士又为群众所支持，这样一来，西南、中央两党的斗争又告兴起，并渐趋激烈，但中央党势力始终不及西南党。在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盐城的地方性公益机关以款产经理处和积谷仓最有权势，因为前者是管理全县公款，后者是管理公粮的，这两个机关的主管人（那时叫总董）都没有薪给，均是绅士的兼差（当然里面所有的职员都是支薪的），而这两个机关的总董都是我父担任，地方官为了

两面敷衍，以中央党的陶慎甫和陶绍甫担任副董，则不过挂名而已。1927年后的禁烟委员会保卫团办公厅和抗战初期的食粮燃料调节处又皆为西南党所包办，（我父任禁委会主任委员与调节处处长，保卫团办公厅主任则为吴继康）西南党的声势也就越来越大了。

1937年抗战发生，蒋贼畏日寇如虎，不敢抵抗，节节败退，南京徐州相继沦陷，一心想发国难财的薛星垣、凌慧庵、田耀东等人企图仿效1927年招待联军过境和1930年招待刘汉民匪军时黄立三、姚树基等大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他们也想在国民党军撤退，日本鬼子将要入侵的混乱之际，趁机大捞一把，于是，便暗中凑合，演出了一幕拟迎敌投降丑剧。他们探知省农民银行盐城分行有地方存款数十万元，打算把这笔巨款借出作好招待日寇之用，还美其名曰：“为了保全地方免遭烧毁。”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薛等先与农行经理胡问渠协商，胡说：“钱是可以借，但需要地方上有威信的绅士出具借条，并由县政府作保证”，薛等又去和县长商讨，当时盐城县长章骏，苏州人，是个老奸巨猾的官场政客。他知道薛等的意图。便先发制人地说：“这事要与张逸老多商量，他是盐城的首席绅士，只要他同意，并肯领衔在借据上签字，县政府才可作保”。薛等无法，又未敢直接与我父商讨，就去找金文山，以金文山出面，请地方绅士谈论，企图包围我父，强其同意。（金文山是盐城著名资本家，一贯居沪，因事变后上海疏散人口回盐，他是西南党，又和我家是亲戚，所以请他和我父说项），席间由金和薛、凌向我父谈及此事，说的非常动听，仍以保全地方不致涂炭为名，并说款子借出以后，如鬼子来了，并不须要我父

或其他绅士出面。可找一个不出名的乡下佬出来任维持会招待日寇，决不会把汉奸帽子弄到绅士头上，云云。我父坚不同意，表示以民族气节为重，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决不做亡国奴，向鬼子妥协，但他们还是坚持强迫我父同意，最后我父答道：“兹事体大，现在方寸已乱，容待考虑”，结果不欢而散。这时已到1938年初，天生港已陷于敌，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甚至有人谣传已听到如皋的炮声了，已有人疏散下乡了，薛等还不死心，又找出田树泉来力劝我父（田树泉为田耀东胞兄，任职上海江苏银行副总经理，事变后银行解散回盐，田耀东虽是中央党，但树泉却是西南党，和我父交情甚厚，又是近邻，因为他新砌了漂亮的住宅，生怕鬼子烧杀遭受损失，为保全私人财产心切，因此上了薛星垣的圈套，力劝我父同意借款，以保地方）。这时我的母亲，和妻子小孩均已临时避乱下乡，仅我父和我未走，田树泉就天天登门说三道四。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树泉又来谈这件事，我父留他吃晚饭，他对我父说：“你不签字，款子就借不出来，鬼子一来，必然烧杀，薛星垣家大楼固然靠不住，你家的大楼我家的房子都保不住了，砌这一片房子不易，如果烧了，再砌也砌不起了，半生辛苦，岂不付诸劫灰？你最好再慎重考虑，考虑！”我父哈哈大笑，对他说：“鬼子来了，生命尚不得保险，还在乎房子吗？民族气节要紧，汉奸我是坚决不干的，烧也好，杀也好，听之而已，头可断，血可流，意志不可屈，你不要再谈这件事了！”因此，中央党想投降的丑剧乃未演成。不久，鬼子真来了，大家都逃难乡间东分西散，中央党、西南党两党之争，至此乃完全结束。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脱稿

记盐城贫儿教养院的始末

张 少 逸

1923年邑人赵乃秋（日本留学生）、季龙图等发起组织贫儿教养院，吸收家庭贫穷、无力求学的儿童，实行半工半读，培养其普通文化和生产技能。经费以募捐办法解决。当由季龙图、赵乃秋、孙景杰、司智生等人出面，向本县殷实富户及各界商号劝募，购买城内“三步两个桥”西北空地一块，及陶姓捐助与空地相邻的花园一所，建了一幢洋式大楼，上下共20间，作为办公室、教室和师生宿舍。又在桥西花园内砌了一部分平房，做竹、木、藤三个工场和食堂。里面还有一所四合院平房，是原有修建的，作为院长室、会计室、总务室、院董室和图书馆，正式成立于1924年春，我父张逸笙任院长，还有院董若干人，并专门聘请了教职员工和工艺教师，招收学生七八十人，食宿衣服和书籍全部由院内供给，学生来源，全是贫寒子弟。授课内容相当于完全小学，三年毕生，升初级中学，院方还可津贴学生升学学费，不升学的也可以有一技之长，以工资糊口。这在当时的旧社会里确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解决了部分贫穷子弟的学习文化和技艺的问题。回忆贫儿院初期，的确办的不错，有一定的成绩，在地方上颇负盛誉。然而，旧社会的统治阶级，每每以兴办慈善为名，借以小恩小惠，企图缓和阶级矛盾，在本质上却仍旧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贫儿院当然也

决不会例外。加之彼时两大绅董派系——中央党与西南党竞争极为尖锐，各树党誉扩大自己的声势。贫儿院是西南党创办的，实际上也就是西南党人的俱乐部，其所聘请的教职员，如教务主任成德斋（即成沧江）、事务主任乔仲杰、会计薛仲丞、庶务王子清、教师刘宪文、张家杰等，还有记不得了，以及各工艺技师，皆清一色西南党人。除院内的日常业务活动以外，西南党人有所集会，皆在贫儿院举行，几乎每天碰头。县知事（即县长）也经常到贫儿院与西南党人商谈，冠盖如云，宴会不断，特别是每年清明时节，贫儿院都要大张宴会，邀请地方官府和各机关及士绅等，举行植树典礼，县知事也亲植一株，以示开头，植树结束，还合摄一影，以留纪念。其他如中秋、春节等举行盛大的宴会。这些豪举的钱都是贫儿院开支的。然而，所做的事却与贫儿院无关。所以说贫儿院是西南党的俱乐部乃恰如其分。我还记得1922年左右，盐城兜率寺的住持印云和新来的圆融，为争夺庙产，争做住持而互打官司，当时县知事为钱立凡，后为庞宗吉。印云和圆融各找西南党和中央党的领袖向官府说情，并馈送厚礼，因西南党不受贿赂，和尚就以捐助为名，赠送田产西乡良田数百亩，作为院产（好象是三百多亩），又送了一块地皮给贫儿院，就是后来建造大楼对面十间洋房的地方。同时和尚对中央党也赠送了厚金，数字多少不详，后来薛星垣家大楼（现为县工业局）就是兜率寺的钱砌的。至于两个和尚的官司，因为双方都有大绅士做靠山，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为了缓和师徒之间的矛盾，庞宗吉从扬州另请一位高僧祥瑞来主持，这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贫儿院的经费，也因此更加充裕，范围又不断扩大，学生由七八十

人，增加到百余人，又添办了织布和石印两个工场，添办了军乐队，添聘了教师和技师。

1927年，北伐告成，国民党取得政权，因为贫儿院不断发展壮大，基金又多，国民党的一些老爷们眼红了，遂于1929年以改组为名，把贫儿院接收了，并由县党部来主办，委派了国民党党棍吴石仙任院长，（即后来的反动派县长）全部人员更换殆尽，结果不到一年，贫儿院所有经费收入，大部入了他们的口袋里，吴石仙眼看贫儿院有垮台的危险，就不告而去，弃而不顾了。其后仍由原创办人和院董等收拾残局，重行整顿，以我父任董事长，季龙图任院长，朱墨香、肖蔚然等为教职员，但由于基金被党老爷吞没太多，元气大伤，经费不足，远远不如以前那样兴旺发达，抗战后又迁至乡间，先后在建湖县的北祁庄、肖家岸办了一个时期，始终未离过解放区，县区首长树海、杨兆熊等同志，均给以支持，终因经费来源困难重重，学生由原来的一百余人，减为四五十人，教职员也减至二三人，直到1948年因经济无着而告结束。

贫儿院开办以后，又成立了贫女教养院，系于1928年成立的，也是西南党人所创办，仍是贫儿院的原发起人所发起，经费也是募集起来的，性质与贫儿院一样，所不同的，即学生都是女学生而已。地址在儒学街南首，即今专署大礼堂南头，但募集经费较少，因此，规模 and 范围不如贫儿院，学生仅有三四十名，教职员全系妇女，教文化的有男教师。第一任院长为沈继贤（原女校校长），后因年老多病辞职，继任院长为陶赤玉（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系我父内侄女）。除学习文化外，有缝纫和刺绣二科，教学生学习技艺，并承做

代客加工业务，以补助经费之不足。那时本城西大街有一女子商店，里面所出售的刺绣商品，大都是贫女院生产的。1934年时，曾因经费发生困难，由旅沪同乡许寿峰（京剧演员，工红净）发起邀请著名的朱筱云京剧团来盐义务演出一个星期，七天中的全部戏票收入，除去演员伙食和剧场必要的开支外，全部捐赠贫女院作经费。后来贫女院又添办了一些服务性的业务，开办了女子浴室和女子理发，这在盐城都是首创的行业，后来又经营熟食糕点，制红糖糕和鸡蛋糕等点心出卖，都是在当时颇为新鲜事业。至1938年春，日寇侵入吾邑，贫女院的校舍被毁，教具用具损失一空，遂告结束。

盐城“双十事件”前后的经过

曹 流

盐城地区在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之前，即有中共地下党秘密活动。至1930年10月10日因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时，为敌人发觉，骆继乾同志等五人先后遭反动政府逮捕，其中三人后在镇江壮烈牺牲。但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盐城人民，后来者再接再厉，继续又向万恶的敌人进行了斗争。兹将“双十事件”发生前后的一鳞半爪的情形叙述下来，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盐城在军阀孙传芳统治时期，反动政府横征暴敛，有官、兵、匪、水、旱、蝗、卤、疫等八大灾害，人民终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其时即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已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和工人运动的政治影响，党的领导人是仇一民。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屠杀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实行反共。因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工作非常困难，不易进展。就在这一年六月国民革命军北伐经过盐城后，七月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即委派戴谨闻为盐城特派员，并派张瑜、朱坚白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八月间孙传芳回师反攻，国民党人逃避，继而孙师败退，才重回盐城组织县党部。九月间戴谨闻等又奉派兼清党委员会委员。十月份国民党省临时执监委员会派薛农山、梁开甲等来盐为县执行委